

陶渊明诗文的饮食书写及文化意义

张静杰

(聊城大学 文学院 山东 聊城 252059)

摘要:中国古代诗人首先集中关注日常生活、大量进行饮食书写的当属东晋陶渊明。陶渊明诗文中涉及饮食者多达六十余篇,约占全部作品之半,在玄言盛行的时代开辟出全新的审美领域。其中频繁出现的“饮酒”“园蔬”、粮食作物等意象,皆是陶耕读生活的实践体验与精神寄托。联系时代与个人经历,陶渊明饮食诗文的深层意蕴包含回归生命本质的选择、突破道释养生的超然、对抗社会礼法的不羁、独饮自乐的洒脱以及微言的政治隐喻等各个方面。这些书写将饮食诗意化,使其从物质需求升华为精神符号,成为陶渊明生命哲学、文化身份与审美理想的重要载体。而以“乞食”“独饮”等意象为题在当时属于开创性的,既丰富了诗文的题材内容又是对传统士族价值观的挑战,具有突出的文化意义。

关键词:陶渊明;饮食;诗文;意义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217(2026)03-0102-09

收稿日期: 2026-03-02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22YJC751044):魏晋南北朝中央官学与文学发展研究。

作者简介: 张静杰(1988-),女,山东烟台人,聊城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6.03.009

中国古代诗文中的饮食书写传统可追溯至《诗经》,其中上至贵族宴飨酒会,下及农夫日常生计,皆有所反映。然而在“诗言志”的时代,无论是《大雅·行苇》及《小雅》中《伐木》《鱼丽》《瓠叶》等篇所描写的宴饮之乐,抑或是《豳风·七月》之类所呈现的四时生活,其意旨往往不在酒肴饮食本身,而重在表现宾主关系、礼制内涵以及农事劳作等社会意义。诚如莫砺锋先生所言:“在先秦至两汉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诗歌的简洁、抒情性质,对饮食的描写或涉及农夫的劳动与生活,如《诗经·国风》;或渲染贵族的宴饮与享乐,如《楚辞》、‘汉乐府’,多是作为‘缘情’的一个方面来呈现,并不能产生感动人心的艺术效果,而真正使饮食题材初露曙光的还要属东晋的陶渊明。”^①此论颇具洞见。在个性、玄理充分发展的魏晋,陶渊明不仅开创了田园、躬耕、日常生活等题材,更是将日常中的饮食贯穿于叙事抒情的方方面面,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审美视角。然陶笔下的饮食书写长期以来多被置于“隐逸文化”或“田园美学”的视域下讨论,或只注重“饮酒”题材,较少详细剖析其作为诗人生命哲学、精神意志与处世态度的文化意义。纵观陶渊明一百四十多篇诗文,其中频繁出现饮酒、园蔬、饥谨、农作物等意象,涉及饮食的达六十多篇,几占全部作品的一半,可谓独辟蹊径、其意深矣。在彰显士族生活的两晋南北朝,关注日常田园、聚焦朴素饮食题材无疑为诗歌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一方面将诗文关注点由士大夫阶层转移到农民田园,一方面成为陶渊明回归自然本真、反抗礼法约束、重塑自我认同的文化实践。从文学发展方面看,陶笔下的“乞食”“独饮”等书写皆为诗歌史上的首创或时代独创,亦成为此后经典的写作题材与范式。简言之,陶渊明的饮食书写大大拓展了诗文的题材、内容,开辟了全新的审美领域,是对当时诗歌文化意义的极大丰富,对后世影响深远。

一、回归自然、本真的选择

作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一生首先思考的哲学问题便是“自然”。此“自然”非仅山林湖海等自然界范围,亦非与世隔绝的“小国寡民”,而是指向一种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自在的状态。在陶心里,人生只能依循本性生活,保持自我本真的形象,故其《归园田居》(其一)首先云“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②,复

^①莫砺锋:《饮食题材的诗意提升:从陶渊明到苏轼》,《文学遗产》2010年第2期。

^②[晋]陶潜撰,袁行需笺注:《陶渊明集笺注》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22年,第74页。

以“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作结。生性热爱自然与自由，既是一种处世的态度，又是一种生命的选择，此种回归自然、本真的生活贯穿陶渊明诗文的始终，而日常饮食书写，恰成为这一哲学意蕴最为质朴而深微的体现。

陶渊明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中明确提出“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①，认为衣食为人生根本，而保证此本源的首要途径当是躬身田园、自力更生。在诗歌中将传统的大道与基本衣食并举，实乃一大胆的创见。《毛诗·曹谱》“昔尧尝游成阳，死而葬焉。舜渔於雷泽，民俗始化。其遗风重厚，多君子，务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积”^②，即表现出上古民风淳朴、基本衣食足矣（“薄衣食”）的思想。《论语·里仁》“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③，亦将简素衣食作为士人追求真理的物质基础。陶渊明对此自然之道的追求，俨然思归上古淳朴之风。其《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仰想东户时，余粮宿中田。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④，亦是对远古时期百姓自给自足、朴素生活的向往。这种鼓腹而游、知足常乐的状态，既有儒家“孔颜乐处”对物质享受的超越，又有道家“知足不辱”安于本心的逍遥。此外，《移居》其二“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⑤，既申明衣食乃生活之本，又强调勤耕为自我实现之途，直接驳斥了两晋南北朝“食禄之家，岂可与农人竞利”^⑥的士人价值观。《杂诗十二首》其八：“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⑦虽深感自己拙于生计，常常挨饿受冻、饮食糟糠，但也表明了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米粮能够解决温饱即可，恰是向质朴本然生命的真切回归。“他很看重衣食以及经营衣食的劳作，不肯像一般隐者做了社会的消耗者，还在唱‘不事家人生产’的高调。……非常率真，也非常近人情。”^⑧朱光潜称赞陶之躬耕率真、近人情，也是肯定其以衣食、自给为人生本位的思想。更重要的是，陶渊明能够知行合一，以躬耕田园来找寻本真的生活。“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一日勤耕之后，一点薄酒便可消解身心疲惫，感受到无求于外界的自足，这正是其所追求的自由自在。考诸陶集，渊明曾耕种水稻、大豆、小麦等基本粮食作物，亦通过此表达饮食观，“菽麦实所羨，孰敢慕甘肥”^⑨（《有会而作》），要求极低，颇有左思“饮河期满腹，贵足不愿余”^⑩的洁身自守。在田园耕读生活中，陶渊明的至乐往往寓于至简之物。“好味止园葵，大懽止稚子”^⑪（《止酒》），葵是当时最常见的蔬菜，幼子在前则是最简单的温暖，这又何尝不是人间最质朴、最本真的状态。若要在平淡的生活中再加一味补剂，那便是自酿之酒了，“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⑫（《饮酒》其十九），无需多少金玉之资，一杯浊酒足以慰己之心。显然，诗人放弃了外在功名利禄的追求，转而选择内心法天贵真的精神自由。

在自谋衣食的躬耕中，陶渊明也实现了从士人到田父的身份转换。这一转变并非仅生活形态的调整，更蕴含深刻的价值重估。其《劝农》诗：

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智巧既萌，资待靡因。谁其赡之，实赖哲人。

哲人伊何？时维后稷。赡之伊何？实曰播殖。舜既躬耕，禹亦稼穡。远若周典，八政始食。

.....

①[晋]陶潜撰，袁行需笺注：《陶渊明集笺注》卷三，第222页。

②[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正义：《毛诗注疏》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673页。

③《论语注疏》卷四，[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71页。

④[晋]陶潜撰，袁行需笺注：《陶渊明集笺注》卷三，第214页。

⑤[晋]陶潜撰，袁行需笺注：《陶渊明集笺注》卷二，第129页。

⑥[梁]沈约撰：《宋书》卷九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70页。

⑦[晋]陶潜撰，袁行需笺注：《陶渊明集笺注》卷四，第347页。

⑧朱光潜：《诗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09-210页。

⑨[晋]陶潜撰，袁行需笺注：《陶渊明集笺注》卷三，第301页。

⑩逯钦立辑校：《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册，第734页。

⑪[晋]陶潜撰，袁行需笺注：《陶渊明集笺注》卷三，第281页。

⑫[晋]陶潜撰，袁行需笺注：《陶渊明集笺注》卷三，第273页。

孔耽道德，樊须是鄙。董乐琴书，田园不履。若能超然，投迹高轨。敢不敛衽，敬赞德美。^①

从“傲然自足，抱朴含真”赞美上古人民自给自足的生活，到“远若周典，八政始食”，指明自古“饮食”乃政务中的头等大事，将饮食与政教结合起来，实现了自然哲学之劳动与饮食的社会伦理化；“哲人伊何？时维后稷。……舜既躬耕，禹亦稼穡”，则以上古圣君贤臣皆自躬耕来强调农事对衣食生计的重要性；“孔耽道德，樊须是鄙”，更是对孔子“吾不如老农”理念的不甚赞同，暗含对儒家传统中某些轻视劳动倾向的反对。《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指出要想获得食粮必须投身稼穡，对传统士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价值观念提出了直接而有力的批判。在两晋南北朝讲究门第等级的社会，贫寒及务农均被视为士人之耻辱，颜之推《颜氏家训》中便提到当时士人“耻涉农商，羞务工伎”^②。但陶渊明却在诗文中明确将务农与自谋衣食标举为人生存续之根本，这一主张不仅与其“质性自然”的生命本真相契，更是对当时士人主流观念的有意识反拨。此外，《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中，“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③数句，亦可见陶并不完全赞同孔子关于君子“谋道不谋食”的理论。诗人虽尊孔子“遗训”，然亦坦承其境界难以企及，从而转投于躬耕自给的实践中。此一转折并非对传统儒家精神的简单否定，而是通过将“谋食”之实践纳入“体道”之过程，重构了“道”与“食”的关系。在陶渊明这里，躬耕田园、自谋衣食，正是回归自然、持守本真的具体途径，日常饮食由此被提升为“自然之道”，展现出其迥异于传统士人玄谈高蹈而轻忽根本的另一种生命取向。

二、“饥者歌其食”的超然

躬耕田园、善于从平凡的生活中发现诗意，是陶渊明诗歌的一大创获。也正因此，陶诗文中的饮食书写具有了新的审美意义，即在粗鄙的饮食中超越世俗追求，展现安贫乐道之趣，这与两晋南朝文学的贵族玄虚、矫饰风气截然不同。《春秋公羊传》：“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④可见，“饥者歌其食”亦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基本理论之一，但与“劳者歌其事”相比，《诗经》以及汉乐府等先秦两汉诗歌中“饥者歌其食”的现象非常稀少，而在这方面开辟道路者亦属陶渊明”^⑤。在日常生活都不足以入诗的时代，于诗文中直言贫寒饥困更是少之又少。陶渊明对饥贫的广泛书写实则是对当时社会尚贵族趣味的正面挑战，使得“固穷”思想从人的道德负荷升华为精神选择。

此方面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乞食》，这是诗歌史上首创以“乞食”为题的诗篇，足见渊明超迈流俗的精神姿态与文学胆识。诗从饥饿写起，“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⑥，将饥馁驱迫下的茫然无措与身体困顿和盘托出；“叩门拙言辞”更是直言困窘之态，显示出乞食之际内心的局促与挣扎，情状逼真，毫无讳饰。但是当主人很解意地招待他后，诗人开始欢饮起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豪放磊落，任真自得。这与《五柳先生传》中“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⑦之描述异曲同工，皆能反映陶渊明之坦率与洒脱，毫无当时所谓名士的虚荣与矫饰。据《世说新语》，“乞食”在东晋一度成为一些士人标榜放达的表现，如襄阳罗友的乞食行为。^⑧然渊明“乞食”之情境、对象与意味皆与之迥异，盖其所叩非权贵之门，所求非浮名之饰，纯然为生计所迫而与寻常人家相接，反在困顿中见出人际交往的朴素真诚。尤须深味者，陶渊明对人之馈赠是有选择与态度的，如晚年饥馁偃卧时，对檀道济所赠之梁肉仍“挥而去之”（见萧统《陶渊明传》）。这不仅是因为儒家“不食嗟来之食”

①[晋]陶潜撰，袁行需笺注：《陶渊明集笺注》卷一，第33页。

②[南朝]颜之推撰：《颜氏家训》卷三，长沙：岳麓书社，2015年，第62页。

③[晋]陶潜撰，袁行需笺注：《陶渊明集笺注》卷三，第196页。

④《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六，[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287页。

⑤莫砺锋：《饮食题材的诗意提升：从陶渊明到苏轼》，《文学遗产》2010年第2期。

⑥[晋]陶潜撰，袁行需笺注：《陶渊明集笺注》卷二，第100页。

⑦[晋]陶潜撰，袁行需笺注：《陶渊明集笺注》卷六，第492页。

⑧见《世说新语·任诞》，[南朝宋]刘义庆著，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卷下之上，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的气节，亦包含对檀道济扶持新朝的不满以及拒与刘宋政权合作的决绝。故，此篇《乞食》乃渊明饥贫生活与率真性格之典型写照。由“乞食”而赋诗，将“乞食”诗意化，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独特的风流。

陶渊明常以“贫士”自居，其《感士不遇赋》《咏贫士》等诗文皆具有浓厚的寒素色彩。对于自身贫寒的生活，他往往直笔描写，且能表达出不同流俗的志趣。如面对时物变迁，他总是遗憾无酒以抒情，“屡阙清醑至，无以乐当年”^①（《岁暮和张常侍》），“感物愿及时，每恨靡所挥”^②（《和胡西曹示顾贼曹》），全然不顾缺衣少食之困境。《咏贫士》其三“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③，其五“当埽有常温，采芣足朝餐”，表面咏古贫士吃糠咽菜，实则均为自身食不果腹之投射。《有会而作》“菽麦实所羨，孰敢慕甘肥。怒如亚九饭，当暑厌寒衣”，坦言能有粗食充饥便已满足，粱肉等更不敢想，以近乎史笔的冷静书写饥寒窘况。当时陶渊明生活贫困又遇灾年，家中甚至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一般此类凄酸苦楚毫无诗意可言，但诗人却从中感受到了先贤安贫守志的通达，“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将物质之“乏”转化为精神之“通”。这种饥者无食的自白与淡然，大大增加了饮食诗的厚度。袁行霈先生言：“‘固穷’和‘安贫’的思想并不新鲜，但‘固穷’和‘安贫’主题却是新鲜的，在陶渊明之前还没有一位诗人如此集中地写过。这也是他的独创。”^④与之相类，以饥寒经历写饮食之艰，并将此种经验提升至主题性的审美与精神层面，同样是陶渊明对诗歌题材、内容的重要开拓。

陶渊明坦然的“饥者歌其食”也是对孔、颜安贫乐道的追寻，观其诗中多用“箪瓢屡空”之语，可谓饮食的间接描写。如“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⑤（《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免”（《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⑥（《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屡空不获年，长饥至于老”^⑦（《饮酒》其十一），皆是将缺衣少食的窘迫诗意化，书写出一种内在充盈、晏然自适的生命情态，是真正超越世俗价值的率性洒脱。其《五柳先生传》中“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箪瓢屡空，晏如也”，更是直接将自己比作颜回，且言自身嗜酒是出于天性，而非当时门阀士族流行的放诞纵酒。可见，他对饮食的书写不只是审美的需求，而是真实生活的感受。其平直写实的笔触突破了东晋尚玄虚、藻饰之风，使得诗歌回到汉乐府诗与文人五言诗书写现实的传统。这种诗风为刘宋鲍照为代表的寒素诗人群体所继承，至唐代杜甫等更是在诗中大量直书贫寒无食之状，使得“饥者歌其食”成为一种经典的诗歌范式。

三、超越佛道的自然蔬食

陶渊明的饮食诗文中除了酒，吟咏最多的便是“园蔬”，且其蔬食非常简单，作为一种自给的饮食文化，这也代表了其返璞的生活与自然的追求。

据《齐民要术》记载，魏晋南北朝时蔬菜种植已经相当普遍，有瓜、茄、芋、葵、蔓菁、莲、芹、菌、菰等多达几十种，且大量进入百姓之家。作为基本生活之需，陶渊明的田园也颇多蔬菜，“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⑧（《读山海经》其一），“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⑨（《和郭主簿二首》其一），“果菜始复生，惊鸟尚未还”（《戊申岁六月中遇火》）等等。寻常菜蔬经诗人点染，遂脱俗而入雅，平淡中见隽永。其中，渊明似乎又对葵菜情有独钟，“新葵郁北牖，嘉穠养南畴”^⑩（《酬刘柴桑》），“流目视西园，晔晔荣紫葵”（《和胡西曹

①[晋]陶潜撰，袁行霈笺注：《陶渊明集笺注》卷二，第163页。

②[晋]陶潜撰，袁行霈笺注：《陶渊明集笺注》卷二，第168页。

③[晋]陶潜撰，袁行霈笺注：《陶渊明集笺注》卷四，第362页。

④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9页。

⑤[晋]陶潜撰，袁行霈笺注：《陶渊明集笺注》卷三，第176页。

⑥[晋]陶潜撰，袁行霈笺注：《陶渊明集笺注》卷三，第202页。

⑦[晋]陶潜撰，袁行霈笺注：《陶渊明集笺注》卷三，第256页。

⑧[晋]陶潜撰，袁行霈笺注：《陶渊明集笺注》卷四，第386页。

⑨[晋]陶潜撰，袁行霈笺注：《陶渊明集笺注》卷二，第141页。

⑩[晋]陶潜撰，袁行霈笺注：《陶渊明集笺注》卷二，第139页。

示顾贼曹》),“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止酒》)。从当时诗文来看,葵、藿等多与寒素清贫相关联,常作为落魄士人的例子,如陆机《君子有所思行》:“无以肉食资,取笑葵与藿。”^①陶渊明却率然表达对葵之喜爱,盖其超然清高的心境投射到生活中,表现出不同士族流俗(以“肉食”为贵)的价值观。“流目视西园,晔晔荣紫葵”,又颇有《紫芝歌》“晔晔紫芝,可以疗饥”^②之感,其中或亦蕴含着陶对商山四皓之类古贤精神风骨的追慕。可以说,陶诗通过“园蔬”营构了一个全新的喜人的饮食类意象,几种简单菜蔬在其笔下皆有了生机,情真意切又别有风味。有论者尝谓陶渊明饮食书写多涉素蔬,或推测其受佛教清修素食风气濡染,“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刍稿有常温,采莒足朝餐”等粗陋野食,亦似与佛门蔬食苦行之风相类。首先,以陈寅恪为代表的前人学者已详考渊明之信仰归属,指出其家世背景与思想取向实近天师道一脉,与当时流行之佛法并未深契。其次,陶笔下之园蔬只作为普通的充饥食物出现,并未被赋予佛教修为之意;再者,陶渊明深刻的思想与复杂的经历使其秉持一种理性、自觉的人生观,其可以直接拒绝慧远庐山莲社“许饮”的邀请,自不必于家中以食蔬羹来表现佛教之修行。因此,陶之蔬食超越了佛教的清修意义,上升到君子食无求饱乃至不在乎世俗物质追求的超然。

同时,魏晋南北朝时受道教修炼影响,服食草木药较为普遍,葛洪《抱朴子》中便有专篇论述草木药服食。其中,菊花已经成为人们所认同的一种服之可以延年益寿、飞升成仙的奇花。作为隐逸诗人的陶渊明自然熟悉这一潮流,《时运》诗中“花药分列,竹林翳如”^③,证明其也有一定的服食习惯。而渊明又是极其爱菊的,其家还有自产的菊花酒,将奇花与酒结合,既满足口腹之欲又能助其精神升华。陶集中涉及服菊、饮菊的文字屡见,意蕴层层递进。如《九日闲居》序:“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④诗人于重阳佳节无酒可饮,只能空服菊花,内心颇为惋惜;诗中言“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又赞扬饮菊酒可以达到身心的双重养生。《饮酒·其七》“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⑤,则是描写采摘新鲜菊花和酒独饮借以忘却尘世的行为。黄文焕《陶诗析义》评此:“遗世之情,我原自远,对酒对菊,又加远一倍矣。”^⑥陶渊明本就有独立出世之愿,饮用能够忘忧的菊酒似乎可以离遗情远世更近一步。因此,其服食菊花超越了道家修炼、长生的欲望,转入追求遗世独立、超凡脱俗的境界。这种追求反映出诗人清远高雅、萧散旷达的情趣,可谓当时的一股清流。从文学发展来看,菊能“制颓龄”之句,为后世所推崇。唐宋以来大量诗歌中写菊之延年功效,陶对这一特殊饮食题材的影响不可谓不大。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虽身处天师道家庭背景,熟知服食文化,其饮菊、服菊之行为却始终未曾陷入对长生久视的迷执,他对宇宙人生的体认达到了一种理性的深度。颜延之《陶征士诔》记陶去世前:“年在中身,疾维痼疾。视死如归,临凶若吉。药剂弗尝,祷祀非恤。”^⑦详细写出了陶面对死亡之从容镇定,既不服药治疗也不祭祀祷告,完全以一种平和的姿态等待生命终结。可见,其最后是超越道教、超越个体生死的精神走向,抵达了哲学意义上的生死澄明之境。陶渊明也有一些关于游仙的诗句,但其游仙途径亦非当时流行的服药、访名山等,而是与酒、食紧密相关。如《连雨独饮》“故老赠余酒,乃言饮得仙。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⑧,他本不相信神仙之说,却能从酒中品出远离世俗、忘乎天地的美妙境界。《读山海经》组诗中的数章,进一步呈现了此种饮食化的游仙想象。《读山海经》其四,“丹木生何许?乃在崑崙阳。黄花复朱实,食之寿命长”^⑨,言食仙山丹木可以延年益寿,汲天地之精华;其五“在世无所须,惟酒与长年”,即便企慕长寿,亦要以所好之酒

①[晋]陆机著,杨明校笺:《陆机集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上册,第358页。

②[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五八,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851页。

③[晋]陶潜撰,袁行需笺注:《陶渊明集笺注》卷一,第10页。

④[晋]陶潜撰,袁行需笺注:《陶渊明集笺注》卷一,第69页。

⑤[晋]陶潜撰,袁行需笺注:《陶渊明集笺注》卷三,第247页。

⑥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编:《陶渊明资料汇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6页。

⑦[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五十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474页。

⑧[晋]陶潜撰,袁行需笺注:《陶渊明集笺注》卷一,第122页。

⑨[晋]陶潜撰,袁行需笺注:《陶渊明集笺注》卷四,第394页。

为伴，无需其它特异功能；其八“赤泉给我饮，员丘足我粮”，想象以神话中的不死民之饮食来助自己超越生死、遨游宇宙。仙界的饮饌在此成为诗人虚己以游的象征，这就超越了传统游仙之飞升、修炼。这种独特的书写，不仅丰富了游仙主题的文学表现，更折射出陶渊明融摄神话、超越宗教，进而归于自身生命哲学的深刻探索。

要言之，种菜食蔬成为陶渊明修身养性、清高出尘的一种生活方式。“园蔬”在他笔下不仅是客观生活的需要，而且成为其审美观照的一部分，诗人通过这隽永的蔬食实现了自我心灵的净化和升华。此种融生活于自然、化日常为诗境的饮食书写，把自《古诗十九首》以来人们对自然的态度提升至一种高度自觉的、哲学化的审美境界，在玄风盛行的晋宋之际开辟出一条迥异时流的文学路径。

四、独酌自乐的洒脱

中国古代诗歌对酒的描写可谓源远流长，然自《诗经》至汉乐府、文人五言诗以及魏晋抒情诗，酒基本伴随祭祀、公宴、会聚、出游等社会性活动出现。尤其魏晋，从建安诸子的公宴酬唱，到竹林名士的纵饮放达，再至金谷园、兰亭等文人雅集，酒虽被赋予追求逍遥、标举风度的精神内涵，却仍承担着礼仪、社交等实用功能。陶渊明既好酒也大量写酒，其集中写酒的作品占一半以上；对酒的描写也不尽相同，有悠然独酌，有与人欢饮，有借酒消愁，有论酒功用等等。但其中最具意味的当是“独酌”，在陶集六十余篇关涉饮酒的诗文中，言及独酌、独饮的多达三十余处。此种将饮酒彻底内化为个人体验与精神自适的方式，在盛行集团宴饮、以酒博名的魏晋南北朝甚不多见。诗人不再假酒以合群，亦不藉醉以鸣高，可以说直接改变了饮酒诗文的传统，展示出一一种遗世独立的姿态。

其《连雨独饮》是第一首也是现存魏晋南北朝唯一一首以“独饮”为题之诗，此后至初唐王勃才有一首《林泉独饮》。与之相应，“独酌”在当时只有南朝两位诗人于正文中写过，一为鲍照《园葵赋》“独酌南轩，拥琴孤听”^①，一为江淹《自序传》“素秋澄景，则独酌虚室”^②，然仅为文中片语，未成主题。此后至唐代王绩《独酌》，李白《月下独酌》，此题方蔚为风气。由此可见，“独酌”成为一种独立的诗歌题材与完整的审美情境，实以陶渊明为关键先导。独酌既是渊明的艺术独创，又代表了他的处世态度。在《连雨独饮》中，诗人以悠然的笔触勾勒出一幅雨中自斟自酌而又自得其乐的画面，以“独饮”为题却并无孤寂之感。对于故老所言饮可成仙之酒，在渊明看来只是一种抛却世事的工具，“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连雨独饮》），他在酒中追求的是与自然运化为一的超然。纵观陶渊明描写独酌的文字，基本皆为闲饮自适状态，如《停云》“静寄东轩，春醪独抚”“有酒有酒，闲饮东窗”^③，即便思念亲友，也可以酒自我安慰。《和郭主簿》其一“春秋作美酒，酒熟吾自斟”，饱含自给自足之欢愉，此处进一步证实了其躬耕实践与自然思想是同步的。还有《时运》“挥兹一觴，陶然自乐”^④，《自祭文》“摔兀穷庐，酣饮赋诗”^⑤，《五柳先生传》“衔觴赋诗，以乐其志”等等，饮酒与赋诗皆是陶找寻自我的途径。无论何种情况，其均能独守任真之心，不为外界影响。萧统《陶渊明文集序》“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也”^⑥，乃深刻认识到他在酒中的寄托和感悟。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自称“性嗜酒”，故即便是独酌也能怡然自乐，而其独酌之趣早已超越口腹之欲，渐臻于藉酒返真、因酒悟理的哲思之境。

毫无疑问，陶渊明是大量创作独酌题材的第一人，其独酌、独饮诗文极大拓宽了文人与酒这一文学母题的书写范围。酒不仅是陶日常饮食的一部分，更是他悠然独处、超越现实之所在。而“独酌”之所以能成

①[南朝宋]鲍照著，丁福林、丛玲校注：《鲍照集校注》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10页。

②[南朝梁]江淹著，丁福林、杨胜朋校注：《江文通集校注》卷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717页。

③[晋]陶潜撰，袁行需笺注：《陶渊明集笺注》卷一，第1页。

④[晋]陶潜撰，袁行需笺注：《陶渊明集笺注》卷一，第8页。

⑤[晋]陶潜撰，袁行需笺注：《陶渊明集笺注》卷七，第546页。

⑥[晋]陶潜撰，袁行需笺注：《陶渊明集笺注》附录一，第603页。

为其文学意象的典型,就在于它能够让个体生命超越时空的局限,在众醉独醒的维度里得到延展。传统研究多认为陶渊明的饮酒与魏晋名士风度及玄学思潮有关,但在陶身上最突出的一点还是通过饮酒表达对现实的反叛。他好酒但并不追风,无视当时以酒作为名士标签的行为。“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①(《己酉岁九月九日》),自酿之浊酒明显区别于士族所追尚的清酒,传达出独处“守拙”的生活美学。“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和郭主簿》),陶不仅放下身段亲自酿酒,甚至沉醉酒中不顾现实所需。《晋书·陶渊明传》载其任彭泽令时“公田悉令种秫”之事,虽经妻子劝谏折衷为秫粳各种,然“令吾常醉于酒足矣”^②的宣言,却表现出其对官僚功利思想的诗意反拨。另,《饮酒》其三“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③,则是对当时人们追求虚名而忽视眼前的批判。魏晋以饮酒名世者不在少数,但此诗中的“世间名”乃现实之功利,渊明将其与饮酒对立,实乃追求真实、自然的理性纯真。《饮酒》其二十“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④,则直接对应了《宋书》中陶潜“葛巾漉酒”的记载,直是诗人不拘礼法、蔑视世俗的率性洒脱。此典被后世不断引用,成为随性、豁达的文学典型。实际上,《饮酒》二十首亦为独饮,其序曰:“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⑤面对纷乱的时代,诗人对影独酌,映照出遗世独立的人格自足。饮酒诗中值得注意的是《饮酒二十首》和《述酒》篇,前者多为独自饮酒兼感慨时事,后者甚至都与饮酒无关,重言晋宋之际的政治变局。邓小军先生《陶渊明〈饮酒〉诗作年考——兼论“亭亭复一纪”之年代问题》^⑥认为《饮酒》当作于永初三年秋分之后,“比夜已长”与《述酒》“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皆以黑夜象征刘宋政治黑暗,而以饮酒象征政治不合作以及隐逸躬耕以保全独立自由人格和生命权利,是来自陶渊明的新玄学实践境界。其《陶渊明〈述酒〉诗补证——兼论陶渊明在晋宋之际的政治态度及其隐居前后两期的不同意义》^⑦,则认为《述酒》诗是揭露刘裕杀害恭帝的微言,是渊明表示绝不奉刘宋正朔、在晋宋之际政治态度的鲜明体现。此处不再赘述。但在酒食书写中蕴含时事评判、表达政治态度,亦为陶渊明批判黑暗现实的一种独特方式。

在陶之独饮中,酒褪去了交际、歌功颂德等社会功用,也摒弃了避祸、及时行乐等厌世情绪,取而代之的是作者本心、情思的寄托,是对生命、宇宙的深微探索,这些探索又往往与其悠然的心境相结合,形成了陶渊明超然物外、纵浪大化的洒脱情怀。

五、其它独特人生体验

陶渊明诗文中的饮食书写丰富多彩,除前文所述诸般特质外,还有许多能够展现其独特的生命体验。如融入田园、与邻同乐,“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归园田居》其五),“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移居》其二),“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杂诗二十首》其一),没有所谓的文人雅趣,也不需刻意经营,粗茶淡饭便冲破了士庶之间的鸿沟,自有一种质朴的温情;既遇知己,欢饮放达,“放欢一遇,既醉还休”(《酬丁柴桑》),“我有旨酒,与汝乐之”(《答庞参军》),酒成为情感交流的纽带,言语间尽显率真豁达的相交之道;唯一的山水诗中也开怀畅饮,“提壶接宾侣,引满更献酬。……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⑧(《游斜川》),将欢饮与山水之乐结合起来从而抛却现实的忧愁,表现出对自然的极度热爱;还有勘破生死意识,“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诸人共游周家墓柏

①[晋]陶潜撰,袁行需笺注:《陶渊明集笺注》卷三,第219页。

②[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九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461页。

③[晋]陶潜撰,袁行需笺注:《陶渊明集笺注》卷三,第238页。

④[晋]陶潜撰,袁行需笺注:《陶渊明集笺注》卷三,第276页。

⑤[晋]陶潜撰,袁行需笺注:《陶渊明集笺注》卷三,第230页。

⑥邓小军:《陶渊明〈饮酒〉诗作年考——兼论“亭亭复一纪”之年代问题》,《晋阳学刊》2007年第5期。

⑦邓小军:《陶渊明〈述酒〉诗补证——兼论陶渊明在晋宋之际的政治态度及其隐居前后两期的不同意义》,《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⑧[晋]陶潜撰,袁行需笺注:《陶渊明集笺注》卷二,第89页。

下》),在墓地“为欢”,可谓极端超脱了;“春醪生浮蚁,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旁”(《拟挽歌辞》其二),以祭奠酒食的想象冷静观照身后虚空,体现出对生命寂灭的坦然。当然,陶渊明之酒食也有基于玄理的思辨,《影答形》“酒云能消忧,方此詎不劣”^①,借影之口,表明立善之功大于以酒消愁之意;《神释》“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直言借酒消忧并不能长寿,反而会使生命虚度。此外,“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②(《拟古》其八),面对易代之际政治的黑暗,其餐葩饮露的饮食也表达出不与世同流合污的高洁情怀。有趣的是,陶诗中有大量“饮酒”书写,却无“饮茶”之文字。早在三国张揖的《广雅》中已有关于制茶的记载,唐代陆羽《茶经》云:“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齐有晏婴,汉有杨雄、司马相如,吴有韦曜,晋有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之徒,皆饮焉。”^③东晋以来,南方地区饮茶亦已传开,《太平广记》载:“晋元帝时,有老姥每旦擎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竞买。”^④一些道教著作及本于方士的传说皆提到饮茶的功效,如陶弘景《杂录》:“茗茶轻身换骨,昔丹丘生、黄山君服之。”^⑤但陶渊明诗文中并未提及,由此亦可见其并不重修仙长生之事。

总而言之,陶渊明在其诗文中展开了对饮食的全方位书写,以质朴无华的笔触将炊爨稼穡、杯酒园蔬纳入诗学观照,为其田园、隐逸生活增添了浓厚的色彩。这种对日常生活的平凡记录不尚清言、不慕玄虚,打破了当时玄言盛行的风气,为东晋诗歌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审美领域。

魏晋南北朝以来,由于个性的极大解放、个人主体意识的强烈突出,饮食书写逐渐从传统的表现社会功用转移到文人士大夫的日常,进而具体到个体的生命活动乃至情感心理。陶渊明的饮食诗文由于其异乎世俗的个性又产生出许多特殊涵义,衍生出“园蔬”“藜羹”“独酌”等一系列典型意象。无论是回归本真生活还是超然出世,无论是固穷安贫还是独饮自乐,其皆能表现出独特的滋味。《老子》云:“乐与饵,过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⑥认为“道”犹如美妙的音乐和美食,能够在平淡中品出滋味才是本质。陶渊明恰恰在躬耕生活与日常饮食中品出了生命之真味,《饮酒》其十四:“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⑦此“深味”即忘怀物我得失、与自然运化为一之味。他的出世入世、得意失意,回归自然的艰辛与自足,对生命宇宙的哲思等等都能够借饮食来表达,酒食与诗意在其笔下实现了深度交融,也为后世对饮食的书写开辟了道路。在此基础上,中国古代诗歌的饮食之味具有了更加丰富深刻的文化意义,后世文人得以在杯盘之间继续探寻个人安顿、社会批判与精神超越的无限可能。

结 语

钟嵘《诗品》将渊明诗列为中品,评曰:“‘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邪?”^⑧是对其质朴省净语言的品鉴,也是对其平实自然内容的评价。陶渊明诗文中的饮食书写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是对当时诗文题材的极大开拓。在现实意义上,这是诗人通过躬耕实践探索人生本质的途径之一,也是其不惧时俗、超然独处的重要依托。其中所包含的文化意义也广泛而深刻:回归自然、本质的选择,既是诗人对生命大道的哲学探索,又是其对抗士族价值观与社会风气的方式;饥贫叙事的超然洒脱,丰富了陶渊明日常生活创作,实践了中国古代“饥者歌其食”的诗歌理论,也突出了陶安贫固穷的意志;超越佛、道的自然蔬食,则在隐逸思想的基础上升华了诗人的处世态度与心灵,是对自我形象的强力塑造;独酌自乐的浪漫色彩,更加彰显出诗人遗世独立、飘然不群的脱俗形象,也极大拓展了当时饮酒诗文的主题范围。处

①[晋]陶潜撰,袁行需笺注:《陶渊明集笺注》卷二,第62页。

②[晋]陶潜撰,袁行需笺注:《陶渊明集笺注》卷四,第331页。

③[唐]陆羽著:《茶经》,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36-37页。

④[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八六七《饮食部》“茗”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611页。

⑤[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八六七《饮食部》“茗”条,第612页。

⑥[魏]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87页。

⑦[晋]陶潜撰,袁行需笺注:《陶渊明集笺注》卷三,第263页。

⑧[南朝]钟嵘著,陈延杰注:《诗品注》卷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41页。

于晋宋易代之际,这些饮食书写中还蕴含着对世俗礼法的挑战、对门阀等级的突破、以及对时事政治的关切和隐喻,值得深入探究。他用清贫的基调和超功利的审美来书写田园中的滋味,其自由精神所表现出的人格力量却产生出强大的感染力,实现了自然主义在个体上的永恒凝定,也巩固了饮食作为其文学生命的一部分。

自陶以后,饮食书写在诗文创作中逐渐丰富、扩展起来。至唐代,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王维等直接继承了陶渊明的传统,写下不少吟咏日常饮食的诗篇。孟浩然《过古人庄》的田家饭食,王维《积雨辋川庄作》的“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葵”^①,皆描写出简朴自然的饮食生活,透露出超然出尘的余韵。李白《赠闾丘处士》“野酌劝芳酒,园蔬烹露葵”^②,其中的野酌、时蔬、葵菜皆可见陶渊明的影子。杜甫也有“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③(《赠卫八处士》)的描写,与陶之“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有异曲同工之妙,与陶遥相呼应,使饮食题材实现了诗意的升华。复至北宋苏轼、南宋陆游,不仅大量写日常饮食,而且躬身种菜灌园、亲执炊爨,饮食书写这一主题蔚为大观。此外,陶渊明的饮食书写也为后世士人提供了一种“耕读—饮食—固穷”的生活范式,成为隐逸文学的典型;其将日常中的饮食从物质需求升华为文化符号,影响了古代文学“以食明志”的传统;而其在饮食中品尝出的“真味”,也奠定了中国古典诗歌“平淡”境界的理论基础。由于陶渊明的作品年代久远且多有散佚,即使宋代以后有多家整理,许多诗文的写作时地仍不确定。若此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再联系当时的时代、社会背景,陶渊明诗文中的饮食意象与文化意义将更加丰富、深刻。

The Dietary Descriptions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in Tao Yuanming's Poems and Prose

ZHANG Jing-jie

(School of Literature,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59, China)

Abstract: The ancient Chinese poet who first focused on daily life and wrote extensively about food and drink is undoubtedly Tao Yuanming of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More than sixty of his poems and essays touched upon food, accounting for nearly half of his total works. In an era dominated by metaphysical discourse, he pioneered a new aesthetic domain. The frequent appearance of images such as “drinking”, “garden vegetables”, and grain crops in his works all stem from his practical experiences and spiritual sustenance in his life of farming and reading. Connecting the era and his personal experiences, the profound implications of Tao's food-related poetry and prose encompass choices to return to the essence of life, transcend the constraints of Taoist and Buddhist health preservation, resist the social norms and etiquette, the carefree joy of drinking alone, and subtle political metaphors. These writings poeticized the food in Tao's works, elevating it from a material need to a spiritual symbol, and making it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Tao's philosophy of life, cultural identity, and aesthetic ideals. Moreover, using themes such as “begging for food” and “drinking alone” was pioneering at the time, not only enriching the subject matter of his poetry and prose but also challenging the traditional values of the aristocratic class, thus holding significant cultural significance.

Keywords: Tao Yuanming; diet; poems and prose; significance

[责任编辑 唐音]

①[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44页。

②[唐]李白著,瞿蜕园、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卷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801页。

③[唐]杜甫著,[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512页。